

紀念勞思光先生

2012年10月22日與朋友晚飯後回家，上網看到勞思光先生前一天在台北寓所去世的消息，心情頓時黯淡下來。哲人逝世，久久不能平靜，種種往事湧上心頭。

對於勞先生，我們可以說是神交在前。1980年代初，因搞不懂公孫龍的「白馬非馬」論，我們翻遍中國哲學史著作，發現只有他簡單幾句話，就把問題講清楚了。從此，我們意識到勞先生對中國思想史的重要性，《新編中國哲學史》成為我們的案頭書。1988年春，觀濤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作短期訪問，其後出席新加坡第二屆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，兩趟都有幸見到勞先生，是為相識之始。翌年春我倆再次訪問中大，7、8月間到勞先生康樂園家中閒坐，他為觀濤算命，得出將長期流亡的推論。當時我們並不相信，沒想到以後真的淹留中大將近二十載，與勞公成為忘年之交。他數度慎重宣稱，要觀濤擔任他的遺著編纂委員會委員，又參加了《二十一世紀》雙月刊的醞釀和創辦，出任第一批編委。

勞公身材瘦小，招風耳，常年穿着深色西裝、打領結，頭髮後梳，一絲不苟，走起路來雙手後背，細邁方步。他經常踱步到我們辦公室聊天，談哲學一語中的，簡潔清晰，品評古今中外學者單刀直入，略無猶豫假借；抽一根煙大約十分鐘，往往留下四根煙頭。勞公藏書不多，議論古今學人著作、觀點乃至章句，都信口拈來。我們常驚嘆勞先生記憶力有異稟，他總會眯着眼、搖頭笑說：老了，老了，不如年輕時候了。春節期間，我們常與石元康、蔡美麗等朋友去勞公家拜年，聽他朗誦新賦詩詞，順他的興頭每人湊出百元賭馬。勞太太則忙於炒年糕、蘿蔔糕招待，熱情留飯。此情此景，猶歷歷在目。

勞先生堅持思想自由，絕不願意在極權制度下生活。1949年他隨父母到台灣，因不滿國民黨獨裁統治，1955年被迫離台、隻身渡海到香港；臨近香港九七回歸，勞先生對未來相當悲觀，又隻身回到已經解嚴的台灣，過教學生涯。他曾對我們說，自他1949年離開大陸，從未跨過羅湖橋半步，以後他也不大願意回香港來了。但他一輩子不改口味，最愛北京菜。在台北，我們和美麗每次陪他上北京館子「天廚」，他必點焦溜丸子和小火燒，一邊把盤子拿到近處，一邊下筷說：「這個還有點兒北京味。」每見此狀，我們就心想，以後總有陪他重遊北京的一天。

2008年觀濤從中大退休到台灣國立政治大學任教，我們和勞先生見面的機會又多起來了。每次都由美麗聯絡安排，先去巴黎花園公寓接勞公，然後打車上北方館子。飯桌閒聊，他最愛追憶往事，談同事和哲學同行。聽他娓娓講述自己所熟悉的二十世紀人和事，如在昨日，而我們心底自不期然會湧起莫名悲哀，這些人不少已經作古多年，而世界早已進入二十一世紀多時了。眼見勞公孤身獨處，日益瘦弱，我們常為他擔憂，問他到底如何打算今後生活。他說：我會一直在華梵大學教書，學校和助理對我很好。他晚年教書主要是講西方哲學，特別重視哈貝馬斯(Jürgen Habermas)。

去年6月22日，我們帶着三位政大學生到台北「天香樓」與勞公吃飯。席間他問美麗：牟宗三先生晚年最愛做甚麼事情消遣？美麗說：找人下圍棋。他笑着評論說：牟先生興致最大，但棋藝總不長進。此後我們不再長住台北了，但絕未料到，此會竟成永訣。



2004年冬與勞思光夫婦攝於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

勞先生去世後，他年輕時代的摯友韋政通先生馬上打電話給我們，感慨不已。我們也與元康和美麗通了電話。據美麗說，前幾天勞先生還在布置新的研究計劃；20日晚9點多以後，因突發嚴重心肌梗塞以致跌倒，完全沒有驚擾旁人，就輕輕地走了。她說，勞先生的墓地很可能選在台灣宜蘭的山上櫻花園，那裏面對一望無際的太平洋。

勞先生已經走進歷史了。我們相信，他對中國學術的貢獻將隨着時光流逝而日益彰顯其重要性。他的《新編中國哲學史》第一卷殺青於1967年，1981年才最後完成第三卷，前後歷時十五年之久。在此期間，大陸發生了文革，台灣掀起儒學復興運動，而在香港，中大新亞書院成為新儒學和中國文化研究的重鎮，先後聚集了牟宗三、唐君毅、勞思光和余英時等著名學者。牟先生立足於康德 (Immanuel Kant) 道德哲學，重新闡釋宋明理學，帶動新儒學興起。勞先生在中大哲學系教課及著述，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中國哲學史著作。該書力求價值中立，思路清晰，從主體性原則梳理出從先秦到清代儒家道德哲學的義理演化史，以及中印佛教的差異。勞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一問世，就成為港台和日韓大學的教材，但至今在大陸知其重要性的人卻屈指可數。我們總是感慨，哪一天勞先生的論說才能引起重視，使今天盲目尋根而不知儒學精神的學子更準確地理解自己的文化啊。

一百多年來，在西學大潮和唯物史觀對中國思想的不可抗拒的衝擊中，中國傳統淪為單純地被維護或者反對的符號，至今仍然如此。在我們看來，在整個二十世紀，能夠堅持中國哲學是道德哲學，突出道德主體的自覺，並且用現代道德哲學的構架，重新價值中立地把儒學發展作系統梳理的，恐怕只勞先生一人而已。從此，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後繼者需在勞先生研究的基礎上去攀登一座高峰，思考道德如何成為我們中國人的終極關懷，道德哲學如何與中國社會互動，以及如何應付外來文明的衝擊。那是中國哲學研究中最令人着迷的，也是西方哲學思考和歷史經驗不可能替代的。

金觀濤、劉青峰